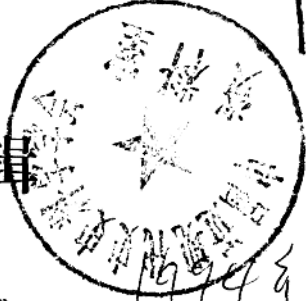


1104

# 海盐文史资料

第 25 辑



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 目 录

人 物 事 秋	<p>垂暮怀旧雨 ——王云五谈张元济……………杨光涛( 1 )</p> <p>情同手足 魂系文化 ——朱希祖与张元济……………袁增培( 4 )</p> <p>张元济丙辰雁荡记游碑及其他……………袁其华( 8 )</p> <p>溇浦近代文士朱福诜和祝靖远……………袁增培( 12 )</p> <p>名医毕云门……………沈吟梅( 14 )</p>
工 商 史 话	<p>昔日上海的溇浦棉布业……………袁增培( 16 )</p> <p>关于《昔日上海的溇浦棉布业》的补充 ……………袁增培撰 姚祖荫述( 25 )</p> <p>海盐磁席业……………徐肇本( 29 )</p> <p>海盐茶、茶庄、茶店……………徐肇本( 30 )</p> <p>六十年前的沈荡米业……………许国权( 32 )</p>
民 俗 ※ 风 情	<p>陈家茶担……………宋季安( 35 )</p>

南北湖胜迹	<p>陈从周与南北湖……………袁增培( 38 )</p> <p>南北湖楹联丛谈……………袁增培( 41 )</p>
编者	<p>来函摘登……………(45)</p>
读者·作者	<p>征稿启事……………(45)</p>
要闻简编	<p>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举行例会……………(46)</p>

# 垂 暮 怀 旧 雨

——王云五谈张元济

杨 光 涛

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79年9月出版了《涉园序跋集录》一书，署名是张元济著，顾廷龙编。此书，曾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7月出版，为繁体字直排本。以台湾本与上海本相对照，发现台湾本将《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一文，撤换为王云五的《跋》。除此之外，两书不仅书名和编、著者署名相同，而且文字及排版亦一模一样。细审之，台湾本采用的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版本的影印本，惟将该版本之5号字略作放大，把原32开本稍稍放宽。

王云五先生于1979年7月25日撰写这篇《跋》时92岁。20天之后（即8月14日），病逝于台北。恰好在这一天，是张元济先生逝世20周年忌辰。张元济先生是1959年8月14日逝世的，享年9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在这个时候出版原董事长张元济先生的这本书，由当时的高龄董事长王云五先生写《跋》，不为无因。不言而喻，这是对张元济先生逝世20周年的诚挚纪念，以表达王云五先生及台湾商务同仁对故旧张元济先生的缅怀。

王云五先生于1949年去台湾，继续从政，曾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1963年7月起，一度代理“行政院”院务，达到其宦途之顶巅。是年年底，辞去一切职务。翌年，复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将主要精力用于旧书稿的整理和出版。王云五的《跋》文中，谈了对张元济的看法，对研究张元济很有价值。

其一，关于张元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的功绩，论述之作已有很多。张元济于1926年辞去监理，改任董事长。王云五于1930年起担任总经理，到抗日战争前夕，商务印书馆确实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与王云五作为总经理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问题在于对董事长张元济的作用应如何评价？王云五在此书《跋》文中提出“直接间接主持”之说，值得重视。他写道：“读此（指《涉园序跋集录》）不仅可知菊老在其直接间接主持本馆之下所刊行之善本，且可藉此获得版本学之精要也。”三十年代出版的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亦云：“张元济以股东兼任编辑所长，实则大事皆由其主政。嗣任监理（按：董事长），值‘一·二八’之变，商务毁，王云五矢力恢复，而为王规划且使之成功者，其元济、高梦旦功也。”

其二，张元济先生著作不多，对其学术成就如何评价？傅增湘先生为菊老《校史随笔》所作序言（1938年），称誉菊老校勘二十四史之学术成就，“时与王、钱（指王鸣盛、钱大昕，皆清代著名史学家）诸人之说互相阐发，而精审且或过之。盖君所采获者，皆前人未见之书，故其论定者，多千古未发之覆。”顾廷龙先生亦说，菊老在古籍版本、校勘学上的成就，“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即使清代校勘名家，亦有所不及。（见《涉园序跋集录后记》1956年）。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1981年）一书中说：“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书的跋，

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王云五先生所见亦同，他写道：“菊老于旧学无不深究，尤以版本校勘为最，于新学亦无不博通，故其处世致用之方，多令科学化也。”

其三，关于张元济与王云五之间的交谊如何？王云五自学成材，进商务印书馆之前，未能尽展其才；1921年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之后，其知名度与日俱增。1930年春又被提升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成就了一番事业。王云五得到张元济的信任器重，对张元济有知遇之感。王云五先生在《跋》文中写了他们二人的交谊：“余于民国十年以后进入本馆，为第三任编译所所长，与菊老为忘年交，无话不谈。菊老平素为谦逾恒，一日笑语余曰，‘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兹以远离善本图书荟萃之故都，或不免稍逊傅沅叔（增湘）矣。’即此一语，可知其对版本学自信之造诣。”王云五先生以垂暮之年，在台北主持出版张元济先生著作，并亲自写《跋》，感怀旧事，余情无限，其交谊之深厚，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附言：谨以此文纪念张元济先生逝世35周年。

# 情同手足，魂系文化

## ——朱希祖与张元济

袁 增 培

民国年间，海盐出了二位著名学者，一位是出版家张元济，一位是历史学家朱希祖，张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经理，朱在北京大学（抗战开始后到南京中央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兼二十四史审查委员会主任，两人同时又是藏书家。为了振兴中华文化，两人一南一北，鸿雁传书，交往密切，堪为盐邑现代文坛佳话。

朱希祖与张元济的交往，据张树年先生《张元济年谱》记载，仅张元济与朱希祖的通信就有50余封，时间从1919年至1937年，交往历经近二十年。朱、张两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又是同乡，故均视对方为知己，情同手足。

朱希祖与张元济的交往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 一、将自己所珍藏的古籍赠送张元济。

1918年夏天，张元济应蔡元培邀请赴北京大学座谈协助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关教科书事，时朱希祖亦应邀在座。同乡相见，亲密无间，朱希祖告诉张元济，他藏有张家古籍《荆州先生精选批点汉书目录》，并将此书送给张元济。使张元济感动得记在此书“跋”里，以志不忘。1922年3月上旬，朱希祖得知张元济在编《四部丛刊》，立即寄赠了《海潮唱和集》、《山樵外记》二书，4月28日又示张元济《史通》一书异版本。1924年6月，为支持张元济编纂大型嘉兴文化古籍《雋李文系》，将自己所藏盐邑文学

家明代彭孙贻《茗斋诗选》赠送给张元济。1925年，张元济正在主编《百衲本二十四史》，手头正需校订史料，去信请朱希祖帮助。不久，朱希祖给张元济寄来了已校好的《五代史跋》，10月上旬又给张元济寄来了《五代史》考订史料，张元济收到后即复信：“蒙指示讹谬，曷胜感幸”。12月，朱希祖又将他所见张家书籍《扞腹斋》稿本去函告知张元济，并抄了书籍目录呈送。1928年4月，朱希祖将其子所著《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及自己《读书题识》二书寄赠张元济。1937年11月26日，朱希祖致书张元济，又寄赠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出版的他的著作《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 二、支持张元济主编古籍，为振兴文化尽力。

1921年，张元济致函朱希祖，告知他正在主编嘉兴文化古籍《携李文系》并向朱希祖征稿，朱希祖慷慨允诺。后复信张元济，告知自己近获得乡贤遗著多种，并已编辑了《携李文系》补稿，同时请张元济将《茗斋诗集》收入《四部丛刊》。1924年3月4日，张元济致书朱希祖，得知朱获张渭鱼遗书精品数种，向朱希祖借《茗斋诗集》拟印入涉园丛刻中。不久，朱希祖复信，并转让了《茗斋诗初集》，后又寄借给张元济《谢山集》、《抱朴居诗》。6月，朱希祖致信张元济，谈“续修邑志事”，并建议在广搜博采的基础上开设海盐乡里文选展览会，请张元济参与续修盐邑志。7月初又致函张元济，再次恳请张元济与之携手共修盐邑县志。1925年元月，朱希祖寄给张元济托他代购的《茗斋杂著》等书。5月又致函张元济，告知张所托代购明代小说《精忠传》珍本的



价格。11月前，又替张元济代购了贯华堂本《水浒传》及张氏旧藏书籍。1927年，朱希祖致信张元济，他藏有张氏刻本《横浦文集》，可供使用。张元济复信朱希祖：“《横浦文集》为本支后裔复刻，不见著录。辱蒙代收，感荷不尽。”1934年春天，朱希祖到上海拜访张元济。张元济告诉朱希祖，李氏裔孙（李开福）已托商务印书馆影印清邑人李聿求《鲁之春秋》。不久，张元济将清样本寄呈朱希祖阅读。朱希祖原有《鲁之春秋》一书，但为别一流传稿本，于是他两本对读校勘，作了校勘记数十条，录呈张元济先生，作为正式稿本出版时的参考改正资料。又为《鲁之春秋》写了评价性的“跋”。在张元济主编大型古籍《四部丛刻》，《百衲本二十四史》、《~~精~~李文系》及《张氏涉园丛刻》期间，张还曾向朱借用万历张鼎思刊本《史通》、宋本《陈书》、《茗斋先生未刻诗稿》、《平寇志》；托购《郑瑞简杂记》；借抄《淳村集》、《曹氏先得录》；托觅《周书》；代查明天启本《两浙名贤录》中各海盐人情况、张元济的先生朱福诜遗著；代搜张氏书籍等事，朱希祖都一一作了努力和答复。

### 三、和张元济同心，关心家乡公益。

1936年初，海盐县长张韶舞制定了拆毁民房造公路入城计划，一时被害居民群起上书呈请改道，但张韶舞置之不理。2月，张元济得知此事，遂以私函上行政院长蒋介石，并献议改沿城垣由西北筑路。不久，朱希祖亦知此事。11月24日，朱希祖致张元济书，谈了海盐筑公路事情况，即刻，张元济给朱希祖寄去了海盐筑路示意的地图及他致蒋介石的信。11月27日，朱希祖复信，言

已收地图及致蒋公信，先将蒋信附还，地图稍留参考，不日寄还。又谈了海盐筑公路交涉情况。12月4日，朱希祖又致张元济书，告以海盐筑路限以12月10日一律拆屋，并闻届时县府将派人拆屋或拘捕人。建议“群赴县堂就拘或可缓时日。一面俟朱家骅主席到省，再请令县长变更计划。”次日，张元济即复朱希祖书，请朱希祖等旅京同乡设法递公贴与将赴任浙江省省长主席的朱家骅。12月20日，朱希祖写信给张元济，并附呈上了由他起草的致浙江省省长公函底稿，有关海盐筑路请改东门至新桥路线。1937年元月9日，张元济回海盐，县长张韶舞采访，谈及海盐筑路事，张元济斥其荒唐，张韶舞自知理亏，除推托此计划原省建设厅计划处，又言自得朱希祖诸君信后此路已停止。2月2日，张元济致书朱希祖，寄上了修复胡震亨墓计划呈文及《在海盐两日之所见所闻》草稿。胡震亨是明代著名学者，其时胡墓破败冷落，张元济为振兴盐邑文化，遂发起修复胡氏墓，得朱希祖赞同。2月14日，朱希祖即复信张元济，认为要迅速全力修复胡氏墓，胡氏墓计划呈文拟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办理似较有力，并准备力促其成。

# 张元济丙辰雁荡记游碑及其他

袁 其 华

重游雁荡山，发现有我国近代藏书家、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张元济丙辰(1916年)记游碑一方，弥足珍贵，特以采辑，以补史料之阙，碑正文为：

“丙辰九月二十五日，蒋君冶招游雁荡，宿灵岩寺。翌日，观小龙湫，探天窗洞，登屏霞嶂，挹龙鼻水，摩崖题名。曼殊白，廷~~安~~记。同游者，海盐张元济、武进蒋维乔、江安傅增湘。”

此碑位于龙鼻洞右壁摩崖题刻之下，碑高90厘米，宽53厘米。除篆书六行正文外，尚有傅增湘乙亥(1936年)重游时增刻楷书二行。

这是一个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据此，我们可以对过去的一些研究作新的审视。这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张元济这次雁荡、天台秋游的原委。

由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先生主编的，新近出版的《张元济年谱》上这样写道：

“10月16日，为避寿偕蒋维乔、傅增湘赴雁荡山，天台山游览。”

(《张元济年谱》91商务版·130页)

认为他这次出游是“避寿”。对此，我们没从有关资料中找到确证，估计《年谱》的作者是由当时正值先生50寿辰的日期推

测而来的。现在碑文为我们指出了游览的直接原因是“蒋君冶招游”。

那么，是否可把“招游”作为直接或外在原因，“为避寿”作为间接的或内在的原因呢？有人肯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以为，张元济此游的原因确实不会这么简单，有直接原因，也可能有间接原因，有外因，也可能还有内因。

1916年是张元济正式开始主持商务的第一年，要抽出一个月时间去旅游，不会是一“招”就会走的。其“内因”肯定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不过它不会是“为避寿”。

张元济一生替人写有寿诗贺文不少，但对自己的生日，观念似很淡薄。从他的《日记》以及《年谱》等上可知，在七十岁之后，才有关于他生辰应酬之事，不仅是五十岁生日，就是六十大寿也没什么动静，因而他这时根本没“避寿”之必要。再退一步讲，即使真有“避寿”的必要，他也只需外出几天，或者更简单地象他八十寿辰时所做的那样，去图书馆呆上一天就可以了。因而，这“内因”我们还得从别的地方去找。《张元济日记》中出游之前有两条材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发行 午刻在梦旦家，与炜士、稚晖谈。炜士言，可备博物船，游行内地。稚晖谓，可包车站卖书，并可备书船入内地。”

（《张元济日记》112页·商务版）

那时，商务正为发行犯愁，张元济于是筹办营业部，调任王仙华去当营业部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段日常闲谈被写进日

记，可知他对这建议的重视。那么，其时的雁荡、天台之游，是否与“入内地”有关？虽不可下定论，也应有疑可存吧？

第二件事更是不能不提：

“八月十二日，星期六

编辑 陈叔通借到雁荡名胜一册，系蒋叔南之物，  
……后商定，以一百元购入版权，另送书五十部。”

(同上·103页)

就在秋游前这个月中，张元济编辑出版了这本《雁荡名胜》。此书与游雁荡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书而游，寻踪觅迹在文人并非罕见之事。

本来，张元济就曾以“我是书丛老蠹鱼”自喻，他与同游者傅增湘又都是藏书家，他们都千方百计地寻异书，觅秘卷，都曾远渡日本访过书。他们当然更知道“江南藏书，以私人收藏为主，有不少寺院书院也珍藏了大量的书籍。寺院藏书除一般书籍外，多为佛经。著名的有灵岩寺、西园寺等”。其时，也正是商务编印《道藏》前后，他们“夜宿灵岩寺”，有否向寺院访书，史料上没记载，碑文中也没说，但在此二十多年后张元济追述这次游历活动的诗中说得明白：

道家灵宇白云深，宝录玄文尚可寻。

喜见异书谁纵读，孙洪遗响未销沉。

(《赠傅况淑》之三十)

由上述材料可以推知，张元济此行的内因应与书有关，蒋君冶的“招游”是促进此行的外因。张元济记此行的另一首诗可以

作为印证：

“看罢龙湫又石梁，心中商榷为书忙。

君矜绳武兴文鉴，我亦完归敬业堂。”<sup>①</sup>

“敬业堂”即清查慎行的《敬业堂集》，共五十卷。“完归”一词告诉我们，他们这次确是来访书，且有收获的。

总之，张元济的雁荡、天台之游不是“为避寿”，而是“为书忙”，这是可下结论的了。张元济爱书，人皆尽知；张元济喜游，有史可稽；张元济为书而游，事业垂千秋！

# 溆浦近代文士朱福铤和祝靖远

袁 增 培

## (一)

朱福铤，号桂卿，清光绪庚辰（1880年）进士，授取编修，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壬辰（1892年）曾参与会试同考，任河南、贵州学政。朱福铤能文能医，是一个很少有的亦官亦医者。曾参加慈禧太后病情的会诊。朱福铤青年时，曾为张元济先生的启蒙老师。朱福铤著有《论学述问》、《复安诗文集》及医学著作数书。文章情真意切，如《祭徐尚书筱云文》。朱福铤是徐用仪的姪子辈，两人关系密切。时朱福铤亦在朝中为官，常和徐用仪相见。徐用仪当时力排众议主和，大触以慈禧为首的主战派之怒，故招来杀身之祸。朱福铤既为用仪亲戚后辈，眼看朝政混乱，国难人祸，曾劝用仪激流勇退，以致亦入祸门。这些一般人不知的内情，福铤把它写在文章里，采用夹叙夹情夹议的写法，使文章跌宕多姿，意切情真，使临危不惧的徐用仪活脱脱地跃在纸上，不愧为名家手笔，今录一段以飨读者：

“盖公自入译署，事悉由公主持。及许、袁二公之人，公颇引以自助，思与诸公竭力补直，以振兴国势，上释宫廷宵旰之忧，然后退修初服。知公之去志固未尝一日忘也，呜呼，岂谓其遽及于祸哉！方奉匪肇事，有同乡朝官，自京来汴梁者述，公于召对时，三次廷争，言甚切至，并云：甲午之役中国尚不能胜一日本，今以一服人庸有冀乎？铤闻而为公危。这及联军深入，公言悉验。私意首事，诸臣必有悔祸之心，仍当任公以维持危局，而许、袁二

公之祸作矣！犹冀公稍委蛇，其间或尚可自全。仍闻公率持初议，侃侃不挠，且力称许、袁之冤不置，以至俱入祸门。呜呼！何其烈矣。”

## (二)

祝静远，素有“浙西才子”之誉，原名绍良，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邑庠生，后毕业于浙江优级师范史地专科，因才学富赡，晚清时作为钦赐举人，民国时曾聘任为浙江省长公署秘书、浙江省议会秘书，浙江省督军署咨议国务院顾问，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秘书主任，海盐县教育局局长，国民政府财政部山东麦粉特税局局长等职。祝静远思想进步，曾与鲁迅在绍兴学堂同事，国共合作时同情革命，曾为《浙江民报》主笔，为革命摇旗呐喊。抗战时在沪组织“西社”诗社，出版刊物，宣传抗日。1935年前后，协助程煦元编校澈浦地方志并鼎力付梓传世，解放前后曾在浙江文史馆工作并从事教育事业，为文教作出了贡献。静远诗文堪称佳品，著有《隋园诗存》一书，书画名家赵冷月题鉴，艺林评价祝静远诗词“既不泥古，又不鹜新，在淡雅中见天趣，於奇想中露才华。”试录二首，《游高士湖》：“绝境开天地，连山到海陬。古人已不见，吾辈且同游。峰影摇晴浦，霞明绚晚洲。荻花枫叶岸，想象旧维舟。”《乙亥端阳高士湖竞渡即席口占》：“家家角黍送端阳，为吊当年一楚狂。千古忠魂应不泯，忍看吾族黯无光。呼朋引侣荡轻舟，人影波光淡欲浮。如此湖山真寂寞，何时高士复来游。尘梦年年西复东，乾坤都付笑谈中。我余短发飘萧甚，又值榴花照眼红。山水争留文字缘，无边风景到樽前。马君莫再耽山水，击楫中流在壮年。”



# 名 医 毕 云 门

沈 吟 梅

毕云门(1884—1925)海盐澉浦人。幼读史书，才思敏捷，聪慧过人。年十六即负笈于余杭名医葛载初门下，习岐黄之术。因其天赋颖敏，又勤奋好学，深得葛师赏识，就悉心教诲，传以心法。学业既成，因葛师年迈力衰，又破例留其代诊(襄诊)三年。在此期间，曾碰到不少奇、难、顽、险之症，就随时问教于师，经师析疑解惑之后，使学识猛进，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为尔后成名立业，奠定了扎实之基础。1905年末，结业辞师，悬壶於澉浦塘湾弄行医。1915年离澉赴沪，在上海爱尔近路(今安庆路)设诊。终因诊务繁忙，劳瘁过度，积劳成疾，医药罔效，于1925年与世长辞，终年仅四十一岁。

毕氏之师葛载初，是清末同光年间驰誉江浙的杰出名医，医术精湛，更精于脉理。毕氏得师真传，且又胆识过人。精内妇科，尤擅长内科杂病之调理而著称于时。善治虚损劳瘵，喜用“独参汤”合“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治血脱症，虽危殆者能辄奏神效。对外感伤病之诊治，亦颇具灼见；虽宗仲景而不囿于经方。用药严谨、胆大智圆，危重之症，经其诊治，常能化险为夷，力挽沉疴。例如：某妇患火症伤寒、高热口干、喉嗽便秘，毕氏用鲜竹沥入煎药，二剂便通热退，再诊而逐步好转。故初出茅庐，就显回春妙手。未几诊务日盛，遐迹驰名。桐庐、富阳等地，亦常有慕名而来求治者，因而诊室盈座(约80平方米)，经常应接不